

香港警队最新宣传片《守城》扣人心弦打动人心

现实中,香港警队比爆款短片《守城》做得更多

新华社香港2月21日电(记者周文其)夜幕下,车队闪着红蓝警灯疾驰而过,奔向香港多地。“Stand by!(准备!)”“Go!Go!Go!(上!上!上!)”话音刚落,一名名警员手持冲锋枪,身着防弹背心,向藏匿的暴徒发起突袭,将其一网打尽。这是香港警队最新宣传片《守城》中的片段。浏览破亿,好评上万,这部扣人心弦的短片打动人心。现实中,香港警队做得更多。特别是“修例风波”以来,面对香港反对派和境外势力的肆意抹黑与恶毒攻击,他们依然专业得当、无惧无畏。“香港是我们共同的家。希望市民看完短片后,更加信任警队,与警队一同维护好这个家的安宁。”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说。

发生恐怖袭击就会这样行动

“哪个警务人员的角色与现实差别很大?”“那一定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执掌警队的邓炳强常常在警察总部统筹指挥。而在片中,他作为一名一线警员,全副武装参与行动。不少市民看到这一幕都忍俊不禁。谈及触影感受,邓炳强笑着说:“演技有点搞笑,大家喜欢就好。”

邓炳强和同事希望通过这一安排传递出“小角色有大意义”的理念。“不分职位高低,每名警务人员的工作都有价值。”郭嘉铨说。

《守城》播出后,许多朋友打电话向公共关系科总督察翁海城“抱怨”:15分钟的片长太短了,应该拍成90分钟!

“真实”是《守城》打动许多市民的一大原因。该片警察角色全部由警务人员饰演,制作团队共动员了超过15个警队单位的600多名人员。

“飞虎队”从直升机绳降降落会展中心天台,“水鬼队”武装涉水潜入攻击位置,爆炸组拉好封锁线安全引爆炸弹……紧张刺激的片段目不暇接。

翁海城说,《守城》没有特技,警务人员大多都是本色出演,“发生恐怖袭击时,就会这样行动”。

“指挥中心,勾到目标,白色旅行车。”“立刻叫其他攻击队去包围!”

站在警务处副处长萧泽颐身边,陈健国一脸坚毅,语调果断地协助指挥。

警察机动部队总部校长,既是陈健国在《守城》中的角色,也是他的现实职务。每年,机动部队都要在防暴、反恐等方面展开多项训练。

“一旦真有恐怖袭击,我还会和影片中一样,协助警队上级处置危局。”他说。

“感谢你们在‘修例风波’中守护香港!”“多谢你们对抗‘黑暴’,成果超出预期,辛苦了!”……看完《守城》,不少网民点赞留言。

诚如网民所言,香港警队一直不畏艰辛地开展执法行动。如今,他们的付出已初见回报。统计显示,“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及违法情况在2020年已有所减少,纵火、刑事毁坏等罪案比2019年减少了25%。



大图:在香港警务处警察机动部队总部,警车待命(2月4日摄)。
小图:香港警务处警察机动部队总部校长陈健国接受采访(2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守护香港安宁。”郭嘉铨说。

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并非陈健国第一次触影。此前,他在一部介绍机动部队的短片中有过演出:出境4秒钟,台词4个字——“继续努力”。

在《守城》中,陈健国的角色更有一些主角色彩。“台词有好几句,出境时间也长了不少。”他说。

即使是本色出演,陈健国依然遇到一些小麻烦。一度台词说错,表情有点不对,与“萧sir”的互动略显磕绊……一番调整下来,他颇费了些周折才完成拍摄。

“比之前拍摄时紧张很多。不过,能多一次体验还是很开心。”他说。

翁海城的心情更激动一些。从前年1月加入公共关系科以来,他已经协助拍摄多部警队短片。过去,他主要协助媒体与具体拍摄对象联络。

这一次,他几乎全程参与了摄制。一连数月,从最初沟通到联络部门,从前期踩点再到协调场地,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第一次看到《守城》成片时,真感觉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呱呱坠地。”他说。

与此前一些警队短片相比,差别更大的是

《守城》摄制前的社会环境。陈健国在1992年就加入了香港警队。在他记忆里,香港警队长期的形象都是专业得当、理性克制。

“修例风波”期间,作为警队应对暴乱的一支关键力量,机动部队屡屡在街头止暴制乱。

然而,反中乱港分子却极尽造谣栽赃之能事,频频抹黑污名警队,把一连串凭空捏造的“指控”扣到警队头上。受此影响,一些市民对警队心存误解。

“从没想到有一天会遭到这么多抹黑。”陈健国说。

许多警察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想向市民展现警队的真实形象。

这次摄制最让翁海城开心的,就是与所有警队单位沟通时都没有遇到困难。无论是警队高层还是一线警员,都愉快地参与了拍摄。

“600多名警务人员通力合作,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尽全力向市民展现警队形象

在9天现场拍摄中,翁海城见证了同事的努力与付出。

由于拍摄时间有限,每天下午四五点就得开始做拍摄准备工作。摄制组从日落时分

开机,一直拍到凌晨五六点太阳升起。

“有关警务人员既要参与拍摄,还得确保正常上班,很不容易。”翁海城说,他们的上司与同事也很配合,尽全力协助完成拍摄。

拍摄期间,翁海城也经历了一些“紧张”时刻。片中一幕戏要在会展中心天台拍摄。由于排期紧张,直到拍摄当天上午会展中心才与警方签约。“没想到时间这么紧。”

事实上,《守城》只是“修例风波”以来警方展现自身形象的妙招之一。2019年11月起,郭嘉铨就带领同事建立了一个直播团队,将暴力示威现场的画面清晰展现给市民。“希望他们多一个角度去理解警方为何要如此执法。”他说。

2020年,警队召开了500多场新闻发布会,安排了150多场专访,其中超过30场都是邓炳强亲自受访。如此高频率的新闻发布,消除了不少谣言与误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警方一些线下活动被迫取消。“未来疫情缓和后,我们会重新举办一些关于培育团队精神的训练,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在郭嘉铨看来,争取更多市民支持警队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维护社会安宁,单靠警方是不够的,一定需要市民守法及支持警方的工作。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澄清误解,与市民一同守护‘我城’。”他说。

(上接1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近日表示,未来对口粮的品质需求将持续提高,对饲料粮的数量需求将持续增加,面对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保障粮食和食物安全,必须从良种方面挖掘潜力。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对粮食市场带来影响再次印证了这句话。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避免关键领域“一剑封喉”,必须加快种业自立自强。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单产在世界上处于比较好的位置,但大豆单产只有约130公斤、玉米约420公斤,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分之二。而在养殖业,生猪、奶牛、白羽肉鸡等种源不同程度依赖国外。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一些品种、领域和环节,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虽然不会“一卡就死”,但确实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

打赢“翻身仗”关键何在?

歌曲《松花江上》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大豆曾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但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大豆产量1960万吨,同期进口大豆10033万吨。国内大豆消费的大头依赖进口。同时,玉米进口也在增加。2020年,我国进口玉米113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35.7%。

专家分析说,除了耕地、水等条件有限外,我国长期以来在水稻、小麦等口粮方面的科研和人力投入多,大豆和玉米方面投入资源相对有限,生物育种等技术应用不充分。玉米起源于南美,我国玉米种质资源并不丰富,缺乏好的育种材料进行重组,需要在资源收集、科研力量、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功夫。

对于短板问题,科研一线正在抓紧“破卡”。虽然正值冬闲时节,吉林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依然很忙。去年他们选育的大豆杂交品种“吉育611”制种产量达到每亩113.87公斤。科研人员正抓紧整理数据,挑选分装种子以备后续试验。吉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研究员张春宝说,我国已选育大豆杂交品种20多个,部分品种平均增产幅度接近15%。

采访中,有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表示,打赢种业翻身仗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种质资源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我国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总量突破52万份,但目前完成资源精准鉴定的不到10%,在挖掘真正有用的基因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

——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待进一步落实。科研人员缺少产业化推广的精力和能力,而种子企业普遍小而散,科研水平不高。“我们倡导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制,但目前资源、人才、资金等是向科研单位倾斜的。”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登安说。

——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到位,科研人员有后顾之忧,不愿与企业合作;而企业也不愿投入,担心遭遇侵权假冒。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尚未形成种质资源利用、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组织体系。

变局之中“蓄势待发”

不久前,在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和杂粮等作物的老中青三代育种人员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考核评估会,报告各自带领的创新团队在种质资源、基因与分子设计、遗传育种、栽培与耕作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并接受多名院士及专家的提问,现场答辩“火药味”浓郁。

“玉米种业能否‘蓄势待发’,大豆种业在新的产业政策下能否‘一触即发’,都是要亮出成绩单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钱前表示,要用科研大比武的方式鼓励围绕产业重大需求进行创新,鼓励揭榜挂帅,集中攻克“卡脖子”技术。

如何打赢翻身仗?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在中国农科院新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建设现场,相关工作正抓紧推进。新的资源库今年建成后,可保存150万份种质资源,保存能力位居世界第一,在智能化、信息化方面也将有显著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推进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重点攻克并建设高通量、规模化表型及基因型鉴定平台,发掘携带优异基因资源种质材料,定向改良创制高产、优质、抗逆、养分高效利用的新种质。

农业农村部已确定,把种业作为“十四五”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保持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竞争优势,缩小玉米、大豆、生猪、奶牛等品种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生物工程技术是育种产业的一把利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育种一体化发展。

“我们期待相关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能够加快启动实施,以产学研用相融合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化。”万建民说,国家支持种业的政策已经明确,“需要科研人员多一些创新精神和责任感,企业家多一些雄心壮志,共同打赢种业翻身仗。”(记者文静、薛钦峰、王朋、张志龙、姜刚、王晖、吴慧珊)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动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野生动物园行业正在“十字路口”上

本报记者张建松

2020年10月17日,上海野生动物园一名工作人员在猛兽区实施作业时,遭到棕熊攻击不幸身亡。日前,这一事件调查结果公布,9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春节期间,上海野生动物园猛兽区(车入区)经调整后已恢复开放。

近年来,我国野生动物园行业发展迅猛,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尤其是猛兽伤人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专家们认为,这反映出野生动物园普遍存在管理不善、理念滞后等问题,亟待进行深刻反思。动物园行业发展不能仅算“经济账”,还要算一算“生态文明账”。

悲剧:工作人员违规下车遭棕熊围攻

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发布的调查报告,2020年10月14日,上海野生动物园景观建设部安排外包单位金艺公司到猛兽区(熊区)翻土除草。10月16日8时30分左右,野生动物园猛兽区班长季某驾驶斑马车,引导金艺公司挖掘机驾驶员徐某某驾驶挖掘机,进入猛兽区(熊区)实施翻土除草作业。野生动物园季某、闵某某、朱某某轮流在斑马车内进行作业监护。

10月17日8时,徐某某驾驶挖掘机进入猛兽区(熊区)进行翻土除草作业。季某、闵某某、朱某某再次轮流在斑马车内进行作业监护。16时30分左右,因挖掘机推土铲右侧履带脱落,徐某某违规离开驾驶室到挖掘机右侧查看车况,坐在斑马车内负责作业监护的朱某某也违规下车,走向徐某某提醒其回到挖掘机驾驶室。

当时,斑马车和挖掘机周边有少数棕熊。朱某某在回程途中,被一头快速窜出的棕熊扑倒撕咬,随后多头熊聚拢一起撕咬。徐某某见状后欲驱赶棕熊施救,但此时,更多的熊聚拢过来,徐某某赶紧拨打了110。等到16时39分施救

人员赶到后驱赶熊群,朱某某已遭遇不幸。类似的不幸事件在上海野生动物园曾有发生。1999年11月,在上海野生动物园,一位司机被三只东北虎咬伤,不幸身亡。

近年来,全国多地野生动物园也曾发生野兽攻击人事件。2014年,河南发生一起9岁男童被黑熊咬断胳膊的事故。2015年,在河北秦皇岛野生动物园,一名游客在参观白虎园时下车,被咬伤死亡。2016年,2名女游客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猛兽区私自下车,遭老虎袭击1死1伤。2017年,一名男子在宁波雅戈尔野生动物园遭老虎袭击,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野生动物园数量猛增,不正常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地兴起了大规模新建“浸入式”参观的野生动物园浪潮。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城市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共有185家,其中野生动物园49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针对一哄而上兴建野生动物园的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就曾出台了管理规定,但由于涉及多个行政主管部门,无权威部门统一规划和管理,许多项目仍然纷纷上马,野生动物园的数量明显过剩。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认为,动物园是一个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特殊行业,不能完全由市场驱动、放任发展。一些野生动物园盲目追求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小而全,同质化现象严重;有的不考虑动物对环境条件要求,大量引进动物,给动物造成了伤害;有的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开展违背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自然规律的游乐项目,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猛兽伤人等事故高发。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研究员郭耕认为,动物园数量迅猛发展,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当前,世界各国动物园的发展数量总体停滞,发展方向由笼养到散养,动物园的建设地点由城市到郊区,提倡人类应该将野生动物看成朋友。

靠“投喂动物”挣钱,是一百多年前的经营水平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野生动物园的经营理念中,动物仅仅是赚钱的工具,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存在很多以“人”为本的行业陋习。

例如,为了招徕游客,一些野生动物园强迫动物表演、与游客合影;为了开发夜间的游览项目,在园内安装太多的灯光照明,破坏了动物的生活习性。又如,游客坐在观光车里有偿投喂动物,成了很多野生动物园的一个“招牌项目”。

郭耕认为,对动物进行投喂,不仅改变了动物的生活习性,也是造成猛兽袭击人的心理根源,是人与动物之间一种“互害”的行为。习惯被投喂的动物对人类有心理预期,一旦没有从游客手中得到食物,就会主动跟随,去扒车、翻包,甚至出现攻击行为。而为了逼迫动物向游客乞讨,迎合游客寻求刺激的心理,一些野生动物园甚至故意不让动物吃饱。

“靠投喂动物、娱乐动物赚钱,是非常低级的,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动物园经营水平。”张劲硕认为,将动物园经营好,可以有许多更科学的良性做法。比如,可以请高级别专家来做科普讲解、举办小小饲养员培训、昆虫标本制作、饲料加工体验活动,甚至可以脱离动物园的展馆,带领大家去野外观鸟等等。这些充满创意的动物科教项目都可以收费,同样可以把动物园做得高雅、高尚,不是非得靠娱乐动物才能赚钱。

专家们认为,野生动物并不完全是被人类欣赏和利用的对象,应有着与人类同样的生存权利。整个动物园行业都应大力倡导“动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引导公众形成“尊重动物、尊重生命”的社会新风尚。

行业发展要多算“生态文明账”

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动物园

是珍稀濒危物种移地保护的重要场所。动物园行业发展不能仅算“经济账”,还要算“生态文明账”。

上海动物园园长裴恩乐认为,无论是城市动物园,还是野生动物园,都应该回归动物园的本质,坚守“移地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三大功能。动物园不是“消费野生动物”的娱乐场所,园方应该引导游客,而不是迎合游客。

因此,要尽可能多地策划、组织符合公益性特点的社会活动,宣传野生动物知识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回归社会公益性的属性,不符合文明理念、生态要求的游乐项目都应该加以明令禁止。同时,深挖动物保护文化,开发文创产品、衍生品,拉长产业链,增加新的盈利模式。

与此同时,动物园行业要强化动物种群管理,树立“动物园之间单一物种的种群管理”理念。同一个物种虽然分布于不同动物园,但是动物园之间要强化合作,要根据动物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血缘关系来进行管理,基于动物谱系的种群统计学和遗传学管理与分析,来进行个体之间的配对繁殖,减少动物的近亲繁殖。通过动物园之间的合作繁殖和共同遵守的“行业公约”,来促进动物的有序管理,而不能将动物园看成是动物园的“私有财产”。

树立“动物为本”的理念,还要强化动物福利保障;积极推动动物收容工作,探讨动物收容的理论和实践运用,促进动物收容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在饲养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编制动物饲养指南和技术规范,形成行业标准和规程。

专家们认为,国家相关部门要引导动物园发展不能过分追求“大而全”,要根据各地情况,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地方特点和本土动物优势的特色种群、特色展区和特色活动,要更多地关注本地物种保护和教育活动。

同时,专家们还呼吁尽快制定野生动物园条例之类的法规和规章,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明确管理职责。鉴于一些野生动物园经营不景气,可走整合改制之路,今后逐步把野生动物园纳入到社会公益事业。